

王粲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战火不断,民不聊生的时代。为避中原之乱,也为实现自己的才能抱负,他前期客居荆楚十六年,依附刘表本欲有所作为,然而却不得重用。于是,建安十三年归附曹操,重回故土。由于王粲前后期政治遭际的迥异、社会境遇的不同,使得他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大相径庭。

## 王粲文学创作思想内容的前后期变化

◎王玲玲<sup>1</sup> 沙登阁<sup>2</sup>

### 前期作品思想内容

记录汉末战乱。身处乱世的王粲,告别故土,流寓荆楚,写出了很多反映汉末战乱现实和百姓深受苦难的作品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王肃传》称“从初平之元,至建安之末,天下分崩,人怀苟且,纲纪既衰,儒道尤甚”。汉末宦官弄权、国事日非、征战不断、民不聊生。初平三年,长安遭董卓和李傕、郭汜之乱,“卓部兵烧洛阳城外百里,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、府库、民家,城内扫地珍尽”“杀之悉尽,死者狼籍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王粲写下了千古名篇《七哀诗》,当时他年仅十六岁。此诗写于他避难荆州,沿途所见百姓生灵涂炭的情景。

抒发思乡之情。王粲滞留荆楚十六年之久,胸怀鸿鹄之志却无法施展,加之独在异乡的孤独感,易生思乡之情。汉乐府《悲歌》云:“悲歌可以当泣,远望可以当归。思念故乡,郁郁累累”对月怀远和登高望远是古人思乡采用的传统方式。于是,王粲在流寓荆州十二年,写下了情真词切的《登楼赋》。“登兹楼以四望兮,聊暇日以销忧”无法排遣的愁绪只能通过登高望远以消愁了,紧接着作者写了一系列的荆楚美景:地之广,水之美,楼之高,物之丰。不可不谓之“信美”,然而乐土并未使王粲流连,相反他却“虽信美而非吾土兮,曾何足以少留!”以乐景反衬了自己的思乡之情之强烈。

感慨壮志难酬。王粲“曾祖父龚,祖父畅,皆为汉三公”,出身世家的他有着强烈的用世之志,他奔赴荆州,投奔刘表,本是想有一番作为的。然而,刘表并非王粲所期望的霸王之才,正如裴潜私谓所亲王粲、司马芝曰:“刘牧非霸王之才,乃欲西伯自处,其败无日矣。”他满足于孤守一方,坐观时变,不图霸王之业。在荆州十六年,王粲始终只是依附于刘表的一个普通幕僚,有一处安身之所而已,却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负。对王粲来说,一方面,汉室丧失权柄,济苍生安社稷是他最大的理想;另一方面,岁月催人老,自己的青春留给了荆楚,却一事无成。王粲本是一个热衷于仕途功名的人,其郁郁而不得志的心情,是不言而喻的。而这种心情,也就很自然地流露在他那些述志抒怀的诗赋之中。在其代表作《登楼赋》中即表达了怀才不遇之情。前面说过,王粲前期的作品中流露了大量的思乡愁绪,其实这种惆怅,不仅仅是远离故土,与亲人的天各一涯,更多则是由于不得重用,对荆楚心生厌倦,故此乡愁愈加无限。

奉命应诏之作。战乱之中的王粲亲身经历了背井离乡,四处漂泊之苦,他急切渴望安定的生活和太平盛世的到来,有强烈的参政意识。对于刘表安定荆州局势的内政外交政策,王粲在思想上是支持的。总结起来,他在荆州帮助刘表做了几件大事:其一,他为巩固荆州的军事活动大造舆论。其二,帮助刘表极力周旋袁绍同盟内的矛盾。刘表结盟袁绍,目的在于牵制曹操,倘使袁绍势力被彻底消灭,这自然会危及荆州的安全。故此,王粲受命以刘表名义分别发出《为刘荆州谏袁谭书》、《为刘荆州与袁尚书》。二书均晓之以礼,动以亲情,劝二袁“先除曹操,以卒先公之恨”;事定之后,乃议兄弟之怨,使记让之士,定曲直之评,不亦上策邪!王粲展现出“疾呼泣血”的情感,展示出“苏张复生”的才力,以期使袁尚、袁谭携手共灭汉室。王粲奉命应诏的作品以文人立言,体现了其很强的文字功底和词章文采,能于诗赋之外别有一番价值。

### 后期作品思想内容

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是长期困扰在王粲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。他已经看到刘表非王霸之才,不足以成大事;而同时他看出曹操是个人杰,“雄略冠时,智谋出世”,用兵“往往如神。”从

归附曹操之后,王粲的命运有了实质性转变。在短短的三五年时间里,他连升数级,最后成了“建安七子”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,是唯一的封侯者。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在这一时期终于得到真正的迸发。

体验随军出征。王粲归附曹操后,深得曹操器重,不仅得到朝廷官职,并且亲自跟随曹操出征,这是无比的荣耀,也是王粲一生难得的人生经历。他先后参加了建安十四年的南征孙权、建安十六年的西征马超、建安十七年的南征孙权、建安二十年的西征张鲁、建安二十一年的南征孙权等重大军事行动。七年当中累计长达两年之久的征戍岁月虽然漫长,然而中原的渐渐统一和曹操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,使王粲的满腔豪情和凌云壮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现和升华。在戎马倥偬生活中,反映军事生活成为了王粲创作的主要题材,也形成了王粲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主题。五首《从军行》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。

邨下文人唱和。闲暇之余,王粲和诸文人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和曹氏兄弟一道相聚宴游,诗酒竞豪。其活动的内容,有弹琴博弈,调筝弄笛,读书论学,更为重要的是吟诗作赋,抒写心声。《初学记》卷十引《魏文帝集》曰:“为太子时,于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,命王粲……等同作。”王粲同当时有名的文人,如曹植、曹丕、徐干、阮瑀等都是好朋友。曹丕在《与吴质书》中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说:“昔日游处,行则连舆,止则接席,何曾须臾相失。每至觞酌流行,丝竹并奏,酒酣耳热,仰而赋诗。”王粲出于文学侍从、属臣的身份竭忠效力、谨慎文辞,在权臣幕僚的位置上写下一些恭谦自勉、颂主扬威的应制诗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王粲大部分诗赋都是奉命与其他文人同题而作。据俞绍初先生辑校的《建安七子集》、严可均先生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及遂钦立先生的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》等对邨下文人同题诗赋作品的数量做了初步统计,分别为:王粲31篇,陈琳9篇,应玚9篇,杨修5篇,繁钦4篇,阮瑀4篇,刘桢、徐幹各3篇。可见,王粲同题诗赋篇数为诸子之冠,而且占其邨下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二。

抒发豪情壮志。由于在刘表手下的不受重视,到归附曹操后被封侯授职,王粲感到心情舒畅,深受鼓舞。追随曹操,在王粲看来正好可以乘时进取,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。在依附曹操的近十年中,他基本上是踌躇满志的。在与曹植等人同作的奉和七体文《七释》中,王粲“致辨于事理”,主张圣王之世,有志之士应当献身于政治,建功立业,“形中情于姐豆,宣德教于四邦”。在奉和曹王的《仿连珠》中,王粲力劝明主要任贤纳谏,“帝王虽贤,非良臣无以济天下”,“听于直言,则过行不累乎身”,饱含着王粲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片赤诚之心和效命时世的真诚。后来王粲追随曹操南征孙权、西征马超、张鲁,写下军旅诗《从军行》。

赞颂曹操武略。王粲依附曹操后曾奉祝曹曰:“明公定冀州之日,下车即缮其甲卒,收其豪杰而用之,以横行天下;及平江、汉,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,使海内回心,望风而愿治,文武并用,英雄毕力,此三王之举也。”应当说王粲的这番话不仅仅是出于应酬,而是表达了他初仕曹操的认识以及甘愿效命曹氏的心情。在《公宴诗》中王粲咏赞宴会盛况,颂誉曹氏美德,具有明显的奉承与效忠意味。

王粲博闻强记、明习前朝礼乐制度的特长引起了曹操的重视,被任命为侍中,和卫凯共同制定魏国朝仪,一起草创了典章制度,《三国志·魏志·王粲传》中记载“时旧仪废弛,兴造制度,粲恒典之”。王粲此时可谓春风得意,达到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,王粲等建安文人的不守礼教同后来的正始文人不同,正始文人在否定礼教的同时,常常是重玄学,尚清谈,好喝酒,鄙薄世务,轻视功烈。而建安文人却一直关注现实,渴望“戮力上国,流惠下民”,王粲的一些诗作也是出于“忧国家之危败,愍百姓之苦毒”,充满了时代感、历史感,既谦恭忠诚,又磊落名节。

(作者单位:1.日照职业技术学院;2.山东水利职业学院)